

大山里的布鞋脚印

□张琦

我从事新闻宣传工作有十三个年头了,对我来说印象最深、感触最大、持续关注时间最长的,就是李振华老师。其间,作为通讯员直接采访或者作为工作人员陪同记者进行采访有六十余次,每次采访和交流对我来说都是一次毫无“杂质”的洗礼与鼓舞。

他是一个“纯粹”的人。他的理想和信念特别干净、纯洁,一门心思,雷打不动,一辈子只干好一件事:用知识改变山里孩子的命运。

71年前,年仅16周岁的李振华,还是个风华正茂,英俊潇洒的江南小生,他积极响应号召,从南京大都市来到沂源最偏远的韩旺村大山深处支教。

他离开的是繁华和热闹,走向的却是荒僻和孤寂。

当初教学的地方是半山腰,由三间破庙改成的教室,四壁透风撒气,大的石头是课桌,小的石头是凳子;没有铃,上下课时间靠吹哨子;没有表,看着日头估摸时间。吃的是黑乎乎的煎饼和糠窝头,晚上缩在一角的床上,外面是漆黑的夜和令人毛骨悚然的野兽叫声。

这样的地方,能有多少人留得住呢?李老师一待就是四十余年,并且一步一个脚印,源源不断地向大山之外输送人才。据统计,当时一起到山东援教的45名青年,留下来的只有李老师一人。其间他离开了远在南京的恋人,拒绝了返城的机会,坚守着大山赋予的初心和责任。

1982年秋,因李振华教书育人成绩突出,上级将“南麻镇城关二中”交给了他。

这是一个怎样的学校?全校108人,平均入学成绩只有28.5分,其中26人数学考了零分,还有学生是有问题的社会少年。

面对这样一个烫手的山芋,李振华觉得肩上的担子比泰山还重,他寝食不安。后来反复观察,细密分析,最后“对症下药”,开出的第一个药方是“爱”。

他提出了“洒向学生全是爱”的治校理念。为了不让学吃发霉的饭,他骑自行车,翻山越岭逐村为学生到家里拿饭。为了更好地照顾住校生,他干脆搬进了男生宿舍,冬天为他们盖被子,夏天给他们驱赶蚊子……“好多男生都是李老师看着长起来的,我就是其中之一。”李老师的学生赵平忠说。

“爱”是最好的良方。后来,学校的升学率达到96%。这个一度被称为“渣滓校”的学校,1986年被评为全县第一批省级文明单位,并更名为“沂源县实验中学”,李老师创造了点石成金的现代教育神话。

“李老师的心特别软。”韩旺村的乡亲们经常这样说。

李振华初到韩旺村,当看到村里连个记分的人都找不出来,只会在墙上画杠记数时,他想:“老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付出那么多,却连最基本的教育都没有。”他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

当他看到山里孩子一双双清澈、求知的眼

睛时,他辗转反侧,睡不着吃香;当他收到大娘大婶省吃俭用、东拼西凑送来的鸡蛋、棉衣时,他在心里记住了老区人民的好,一记就是一辈子。

他说:“我是受沂蒙精神的感召来的,仅我教学的韩旺村就有8人在孟良崮战役中牺牲。相比革命战争年代,这点苦、这点付出算什么?”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沂源县是国家级重点贫困县,乡亲们生活很困难。李老师从工作的第一个月起每月拿出工资的四分之一资助贫困生;将外出助教8年所得50万元全部捐出用于助学扶困;先后资助贫困学生2400多名,个人捐款163万元。

至今,年近90岁的他,仍然每月只留下500元退休金作为基本生活费,其他全部资助困难学生。几十年来,他一直一天三顿粗茶淡饭、萝卜咸菜,每天步行万余步却从不掏钱打车,喝茶大贵白开水是标配,衣角磨破泛白、千层底布鞋断了又补上。

眼前,这个体形消瘦、脸色泛黄、背有点佝偻的老人,走在人群中,毫不起眼。但是他“极简”的背后,谁也想不到的,是他对山区孩子长达七十多年的上百万元捐助。

我有时觉得,李振华老师人生账本里的公与私有些“不近人情”,甚至是“固执”的。

他培养了近万名优秀学生,自己的孩子却没能走进大学校门。当年,他把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接到了沂源,接到身边,但老人本来体弱,又因为水土不服,不到一年就去世了。这已然成为他永远的心痛,如同总也无法释怀的叹息。“我是一名人民教师,不是家庭教师”,为了学生,他能放弃一切个人利益,他称自己是不称职的儿子、不称职的父亲和丈夫。

不久前,我再次见到李老师,当我再次凝望他时,才发现他已是满头白发,背再也不能挺直,腿再也不能急行,耳朵再也不能清晰地倾听;他的一双老布鞋依旧熨帖地踏在地上,他的衣领处早已破损脱线,那线正随风摆动好像诉说着什么。

在燃烧了大半生后,他才是最需要关心的人,最需要照顾的人。但他依然说,退休只是换了个地方工作。因为知道自己年纪大了,要更加珍惜每分每秒,只争朝夕做好自己能做的一切……

退休后,他又将自己的积蓄和国务院特殊津贴全部捐出,成立了三个“助学基金会”,还专门设立了“振华青少年思想疏导热线”,与省内外260多名青少年建立长期帮促关系。他创建了“道德讲堂”和“孝德讲堂”,义务为学生开展红色教育、优秀传统文化教育300多场;他在全国各地志愿宣讲3400多场,听众达100多万人次。

他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燃灯人”“布鞋校长”“孺子牛”。

至今,他依然忙碌在青少年思想教育的“热线”上,站在四点半学校和孝德讲堂上,奔走在助教助学的道路上。

一双布鞋,在青石上踏出了坚实的脚步。

(本文作者为沂源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

□金后子

盼了两年的新房刚下来,我兴冲冲地去收房。一梯两户,乘电梯到四楼,过道里站着一位男子,是我的新邻居,老杜。

几次碰面之间,聊得最多的还是文学,有说不完的话。细谈得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文学最火爆的年代,老杜就开始发表作品,他的妻子老殷也是文学爱好者,两人因文学而结缘。日后老杜拿给我一本泛黄、纸张已变脆的杂志,上面有他的中篇小说《多雾的秋天》,写的是农民卖棉的艰难经历,人物、情节、句式让人不忍释卷。读后跟老杜交流,他说:“就是因为这篇小说引起重视,全国开展打击卖粮卖棉拉关系走后门的行动,老百姓拍手叫好。”

后来,我向老杜介绍周三读书会,并约他参加,他说继1984年参加山东省文学讲习所,相隔几十年,终于又找到了组织,去过两次后,表态道:“只要我在济南,保证按时到场。”老杜参加读书会,专业水平很快彰显,发挥出主导作用,尤其他对作品的点评令同学们服气。特别是点评散文时,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只摆事实,不讲道理”。道理读者要比你明白,一定要给读者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间。尽量不用或少用成语,去掉概念化的描写。

每当评点到尽兴处,他习惯用右手食指和中指敲着桌子说:“内容好,句子得当的。”话落处,仿佛能听到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清脆。这时,比他小一岁的春生先生就会接过话题讲:“文学是曲笔艺术,只要把情节和细节写深写透就行了。”一唱一和,天衣无缝。同学们称杜维、春生先生是周三读书会的两座山,一是写得好,二是评得好。两座山遥相呼应,成为读书会的定海神针。同学们说,来读书会很大程度上是冲着这两座山来的。

最近老杜点评崔青同学《葛亮》一文写道:“用散文的语态写小说,笔调冷峻,不疾不徐,细节中的每个点都抠得很准。文章铺设明暗两条线,明线是腊八这天,强子给母亲烧完头七,攀上云顶草铺,眯起眼睛看灰色的长天……崔青的切入点十分巧妙,她不是平述故事,而是通过私生子的一生。这就使文章精练简约,笔触直入伤痛深处……”观点非常精到。

除了码字著文,老杜还有一大爱好,那就是美食。他不仅善品尝,关键是亲手做,用他的话说:“我就是好这一手。”逢年过节,经常吃

到老杜送过来的美味,今年春节送来的扒蹄和“杜氏炸肉”,至今回味无穷,妻子评价:“这是六十年来吃到滋味最好的扒蹄。”他做的炸肉,也不知用的什么妙法,香、脆,还略带几丝麻辣,若不是担心血脂升高,我会一口气干掉那一盘的。据老杜说,年前年后,他光买猪蹄就花了三千多元,做好后大都送出去了。老杜说:“图的就是这个热闹。”

老杜夫妇都好客,家里经常来人小聚,酒多从中午喝到晚上。中午时分,只要听到他家门口有人说笑,门哐哐地响,准是有朋友来了。最近一次聚餐,听到人特别多,时间也长,从中午到晚上九点才散场。第二天碰上老杜,一问,昨天是他生日,亲朋好友都来为他祝寿。“岁数大了,注意休息。”我提醒到,老杜淡淡一笑:“我这个点比较皮实,好点秃点,早点晚点都无所谓,习惯了。”

刚搬来时,老杜经常喊我到他家陪客,后来发现我中午困乏,尽管苦苦支撑,还是有一次在沙发上睡着了,自此,就不再喊我。后来,老杜也到我这里凑过牌局,问他打得咋样?他说没有不会的,可两把牌后就露了真身,根本跟不上节奏。打那,三缺一时就不再喊他。正像人世间不会有两片相同的叶子,很投契的我们也有着各自的不同。

每当春风送暖,杨柳吐芽,老杜就开始“东巡”,时间多半是一周左右。到淄博吃鲁菜,到潍坊吃酥锅,到胶东吃海鲜,到滨州吃蒸鱼……讲到高兴处手舞足蹈、神采飞扬,幸福挂在脸上。他从淄博回来写的《博山菜》一文,勾出读书会很多同学的馋虫,纷纷要求去博山大吃一顿。

老杜经常说,做菜与写文章是相通的,做菜靠食材,文章靠素材,关键是搭配和火候。做菜讲究先放什么后放什么,写文章也是先写谁后写谁,搭配合理,用心操作,虚实繁简安排得当,自然是一马平川,风行水上,否则是一锅糨糊。

老杜也画画,专画马,我好书法。去年秋天的一个夜晚,站在书案旁,借着月光,我突然想到老杜,想到文学,兴起,挥毫写道:“一对文人,两个兄弟。西江月光,洒在心里。”很是痛快。

有次跟妻子说起老杜夫妇,妻子说:“摊上什么样的邻居,得看命。若对门德行不好,你也得面对。能摊上老杜、老殷这样的对门,是祖上的德。”“是八辈子的德!”我答。

(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济南周三读书会创始人)

【局域网】

雅邻老杜